

如何认识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

□杜运泉

内容摘要 1949年后,中共干部队伍中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三害”现象。虽然中共中央及时发动“三反”运动,通过疾风骤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迅速改变了局面,赢得了民心,巩固了执政地位;但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来改进政治生态,只能治标,但不治本。建国初期“三害”现象主要发生在某些领域、某些群体中,不能代表干部队伍的全部。不能过于夸大其严重性,以此判断整个政治生态已恶化。考察政治生态的整体状况,首先要建立政治生态分析的科学框架。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团结包容、生动活泼、积极向上。

关键词 “三害”现象 “三反”运动 政治生态

作者 杜运泉,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探索与争鸣》编辑。(上海200241)

在政治生态的历史研究中,1937—1945年的延安时期和1949—1956年的建国初期是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转型时期。这一历史转型时期政治生态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研究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绕不开“三反”运动。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相比,“三反”运动显得分量很轻,但它却是研究建国初期政治生态的一个最佳样本。因为它既是建国初期中共进行政治生态建设的一次重要探索,这个运动本身也体现了建国后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然而在通过研究“三反”运动来考察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时,会面临一个表面看似矛盾的问题,即从历史比较视角来看,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相比建国前国民党统治末期,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通常的历史叙述都是如此。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她朝气蓬勃的、积极向上、充满希望……,人们大多用类似语言来描绘新中国。然而就是在新中国刚诞生一两年的时间里,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队伍中却出现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时称“三害”现象。

乃至后来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震怒和忧虑,引发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即“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还出现了“打虎”的高潮,打出了一大批“老虎”。蔓延的“三害”现象,数量巨大的“老虎”,显得与新政权、新社会并不协调,甚至有人怀疑中共刚刚执政是不是就已经腐化堕落了,认为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那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应如何认识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尤其是政治生态呢?

理性看待“三害”现象与“三反”运动

建国初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确已出现贪污现象,且呈蔓延之势,这可以从中共各级组织的报告中窥见一二。

如北京市人民法院自1949年3月1日至1951年11月30日共受理贪污案537件,发案率不是日趋减少,而是日趋增多。1949年的10个月中受理110案,平均每月11案;1950年受理196案,平均每月16案



多; 1951年11个月受理231案, 平均每月21案。^[1]

1951年3月6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委向东北局报告关于处理干部贪污的问题。报告中说, 东北地区党内党外干部中贪污腐化的现象极为严重。不仅新干部(包括留用干部)中有普遍的贪污现象, 就是县级以上的老干部中也有贪污现象, 甚至在省一级的老干部中也发现贪污现象。1951年4月20日, 东北局纪委检查处检查员在关于干部贪污问题的报告中说, 根据对沈阳市人民法院在押犯人的调查, 发现贪污犯的比例逐年增加, 案情由小到大。1949年下半年, 贪污犯占在押犯总人数的5.3%, 1950年占7.2%, 1951年第1季度占13.2%。^[2]

以上统计数据出现在“三反”运动开展前或刚刚发动时期中共各级组织的报告中, 相比“三反”运动深入发动后出现的指标层层加码的“打虎”阶段, 此时的数据真实度更高。

中共各级党组织发现“三害”问题后, 及时把相关情况向上级和中央做了汇报。中央在不断接到相关报告后, 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因而发动“三反”运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论证“三反”运动的必要性, 以及为了颂扬“三反”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而夸大干部队伍中“三害”问题的严重性, 以此推断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更不能据此攻击中共建政没几年便迅速堕落。对于“三害”问题和“三反”运动, 我们要把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下, 辩证客观地加以分析。

第一, “三害”问题主要集中于留用干部和新干部, 绝大多数老干部仍保持着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建国之初, 干部队伍的构成非常复杂。1951年3月, 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 除军队外, 当时全国党的干部与非党的干部大约有175万人左右。其中, 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60多万; 1949年以后参加工作的70万人左右; 从国民党政府机关留用下来的约有40万人左右。^[3] 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 即老干部; 1949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干部, 即新干部; 从国民党旧政府机关留用下来的即留用干部, 也称旧干部。

留用干部身上带有一些旧政权时期不良的习气

和作风。建国后, 出于工作需要和社会稳定的考虑, 新政权对不抵抗的旧政权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他们继续留在原工作岗位, 经审查甄别后, 便成为新政权的干部。当时由于各项工作的繁重, 只对他们进行了短期培训, 还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改造, 便安排他们在各种工作岗位上。正是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放松了自我改造, 面对各种诱惑, 加上制度不健全, 他们重拾旧社会的各种不良习气, 出现官僚主义和浪费行为, 严重者贪污受贿, 走向违法犯罪。

新干部和留用干部的情况有较大不同。建国初期的新干部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出身, 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由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成为新政权的工作人员。他们较少有旧社会的习气, 但缺乏社会经验, 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时期的磨炼, 不了解底层百姓的疾苦和需求, 习惯于清闲的机关生活; 虽有工作热情, 但往往眼高手低, 自视较高; 而且追求物质生活, 容易染上官僚主义和奢侈浪费的作风。当然极少数老干部进城后也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开始贪图享受, 甚至出现贪污的问题。

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显示: 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多人, 其中共产党员19.6万多人, 占贪污总人数的16.3%。^[4] 这一数据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三害”问题的人群分布特征。

第二, 虽然“三反”运动成就巨大, 但许多被查出的“三害”问题并不严重, 属于错误行为, 而不是犯罪行为。对于“三害”问题, 我们要区分错误与犯罪。大多数人只是犯了贪污浪费的错误, 或只是很轻微的占公家便宜的行为, 但还没有构成犯罪。在上述120.3万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人中, 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105916人, 只占贪污总人数8.8%。^[5] 而根据1952年4月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个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 判处1年以上徒刑; 个人贪污不满1000万元者, 判处1年以下的徒刑、劳役或管制, 或免刑予以开除、撤职、降职、降级、记过或警告的行政处分。^[6] 经审理定案, 绝大多数免于处分, 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在已处理的部分中, 免于处分的占75.7%, 给予行政处分的占20.7%。判处刑事处分的38402人, 占

已处理部分的 3.6%。其中机关管制的 17175 人，占判处刑事处分的 44.7%；劳动改造的 11165 人，占 29.1%；判处有期徒刑的 9942 人，占 25.9%；判处无期徒刑的 67 人，占 0.17%；经中央和大行政区批准判处死刑的 42 人（内有杀人犯 5 人），死刑缓刑 9 人，共计 51 人，占 0.14%。^[7]可见，“三反”运动中，有贪污行为的人中，绝大多数是犯了违纪、违规错误，只有极少数构成犯罪。

第三，“三害”问题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建国初期，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为解决党政机关的经费和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当时采取了机关生产的做法。这为贪污浪费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同时有些行为当时也属于灰色地带，是规章制度缺失或不明晰造成的。后来在认识到这些问题后，中央对于有问题人员的处理也采取了从轻的方针，大多免于行政处分或仅限于行政处分，只有极少数人员被处以刑事处罚。同时，广大基层干部也是普通人，与普通百姓一样有家庭，有物质生活的需求。而当时是物质短缺时代，干部待遇在建国初期实行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但待遇标准不高，一些负担较重的干部家庭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一些干部为了改善生活，趁制度不健全之机，偷占公家物质、钱款，以权谋私等现象便产生了。

第四，“三反”运动中的“打虎”战役，出现了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情况，产生了定指标、逼供信的问题。但中央及时纠正了偏差，在定案处理阶段大多已改正过来。1952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这份报告总结了“三反”运动处理工作的情况“三反”运动中全国打出 1000 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最高数 29.2 万多人，现在剩下 10.5 万多人，减少了 65% 左右。东北区“老虎”下降最少，约 31%；华东区下降比例最大，为 83%。从“老虎”数字下降的情况看：由于追算时间过长，折算标准不统一，折价过高而成为“老虎”的约占 33%；小贪污打过头而成为“老虎”的约占 47%；由于对贪污界限不清，把公私不分、失职、浪费和有政治问题的人算成“老虎”的约占 15%；根本没有贪污，完全打错了的约占 5%（河北最高，占 10.54%）。^[8]

第五，建国初期干部队伍中的“三害”问题，

是刚刚出现苗头就被压制打击下去。这说明了中共领导人没有因胜利而冲昏头脑、骄傲自满，对干部队伍中的问题，没有采取无视、忽视的态度，回避问题，掩盖问题，任其发展下去；而是保持了一种清醒和警惕，直面问题、重视问题、试图解决问题，马上采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加以涤荡。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零容忍”，也表明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并没有恶化。经过“三反”运动的整顿，以及整党运动的改造，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大幅减少，干部的群众观念和廉洁性明显提升。所以，“三反”运动迅速涤荡了旧社会留下的习气和作风，使干部队伍层面的政治生态快速得到改观，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共执政地位的认同。“三反”运动为之后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良好的政治生态奠定了基础。当然，采取运动式治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等问题，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第六，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现象的产生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本文的重点并不是探讨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的具体原因——我们要充分认识清除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现象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我们不能把新政权的政治生态想象得过于理想化，认为新政权建立了，政治生态立马就会面貌一新。当时有一种流行观点，将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视为剥削阶级独有的弊病，是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绝缘的；我们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就不会再有腐败。其实，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三害”现象看作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结果；也不能期望通过一场疾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就能彻底清除之。清除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现象，无法一蹴而就。

总之，建国初期“三害”现象的蔓延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带有结构性特征，是集中在某些领域、某些群体中的行为表现，不能代表干部队伍的全部。不能过于夸大其严重性，也不能无限放大，以此判断中共已腐化堕落。更要看到政治生态的整体状况，要全面考察、辩证分析。

政治生态的立体分析框架

政治生态的所指，不限于是否贪污腐败等问题，其内涵要丰富得多。要对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能只从某一点或某一方面进行分析，而应该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分析。

笔者将政治生态的分析框架概括为一轴、三维、三层：一轴指政治生活的主体或行为体，现代政治生活的主体不限于少数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而是享有政治权利的全体公民及其组织；三维是指，从构成要素的角度来看，政治生态可以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等角度进行考察；三层是指，从纵向层次来讲，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来理解政治生态。

从政治系统的构成来讲，政治系统由各种政治行为体构成，他们的行为和关系构成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政治生活的有序进行则需要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政治行为体要沿着制度的轨道作为；同时，政治行为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取向的活生生的人和组织，而不是机械地沿着轨道运行的机器。所以，政治生活以政治主体为中心轴，以制度和价值为两翼，以政治行为为表征和结果。政治行为体在制度和价值的双轮驱动下，发生互动关系，构成政治生活。相应地，对特定政治系统的政治生态，也就可以从制度、行为、价值的三重维度进行评估和分析。

考察政治生态，也可以从纵向维度分为宏观、中观、微观等层次，但这种划分并不精准，而且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从政治系统的角度，可以把整个政治系统内部及其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状态作为宏观层次的政治生态，把某一个政治子系统内部的关系状态作为中观层次的政治生态，把个体所处的小范围基层政治组织内部的关系状态理解为微观层次的政治生态。还有一种划分方法，就是把整个国家范围的政治生态视为宏观层次，某一省份、大的区域或领域的政治生态视为中观层次，县级以下地域或组织的政治生态视为微观层次。

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各子系统、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和整体不可分割性。政治生态也是如此，它是一种作为整体存在的总体性状态。我

们在考察特定系统的政治生态时，必须采用一种整体的眼光，系统分析制度、文化、行为等维度，以及宏观、中观、微观等层次，而不能以偏概全。同时，也不能只看到整体，而遮蔽部门的特点或问题。

全面、科学地认识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

依据上述政治生态的立体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团结包容、生动活泼、积极向上。主要依据如下：

新中国是由中共召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成立的。新政协制定了《共同纲领》，并选举产生了具有联合政府性质的中央人民政府。《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政协全体会议选举出的中央人民政府设副主席6名，民主人士3名，占50%；委员56名，民主人士27名，占48%；政务院副总理4名，民主人士2名，占50%；政务委员15名，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民主人士42名，占45%。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不仅有制度规定，而且体现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本文不再赘述。可以说，中共与民主党派保持了一种团结协商、生动活泼的良好政治生态。

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确立了既有权威又有民主的行为方式，从而保证了团结与稳定。“由于党的精英对维护明确限定的权力关系和党的团结具有强烈的义务感，政策的分歧问题可以在正式的讨论会内进行激烈的辩论，而不会给政权带来危险。……相对而言的无拘束的辩论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达成全面而灵活的决议的可能性。一旦作出决议，对团结的义务以及列宁主义纪律的正式准则通常能保证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负责领导人中迅速地贯彻。总而言之，一个团结的领导集团形成的权威和信任的气氛有助于加深普通官员和民众的印象，从而提高他们实现党纲或承认党纲的热情。”^[9]

1954年之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

来，正式宪法还未制定，而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作用。所以，在国家制度方面，虽然还有很多空白，但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初步确立，为良好政治生态奠定了基石。

建国初期，中共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局面，有众多紧迫的工作要去完成，因此客观上没有太多精力投入具体领域细致的建章立制工作。而且革命时期的干部队伍养成了坚定的革命意识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刚在全国执政不久时，大多数干部仍然保持着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和精神自觉，所以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对制度建设形成强烈需求；加上中国历来就有重道德修养和自律的传统，所以执政党主观上对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也不够。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就把重点放在了道德自律方面。因此，建国初期虽然未形成严密的制度体系，但靠着足够的警惕自觉和革命意识，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和现实行为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

建国初期尚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奉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当时是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情况。但从政治文化领域看，马克思主义已经彰显指导作用和主导地位，中央对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非常重视，尤其是把“三反”运动与思想建党相结合。“三害”问题的蔓延，说明干部队伍在思想上确实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腐蚀。这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要求各地在“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抓思想改造与建设，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消极情绪和错误思想。经过思想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总体方向还是积极向上的。在党外，中共的开放包容和执政能力在民主人士中赢得了空前的威信，绝大多数民主人士都愿意接受思想改造，通过学习运动，批判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立场，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三害”现象不能代表建国初期政

治生态的全部，我们不能把建国初期总体向好的政治生态与“三反”运动的发生对立起来。既不能以前者为据，质疑后者的正当性，也不能以后者为据，否定前者的真实性。

良好的政治生态不是自然形成的，它需要积极地建构；良好的政治生态的形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积极地探索。良好的政治生态是一个围绕政治主体而构建的立体系统，包括制度、文化、行为等维度，以及宏观、中观、微观等层次。考察政治生态，要用整体思维，从多维度、多层次进行把握。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整体掩盖部分。

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既有积极和谐的大好局面，但也面临暗流涌动的风险，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共刚执政不久干部队伍中就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三害”现象。“三害”现象不仅破坏了建国初期良好的政治生态大局，也对中共执政地位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虽然中共中央及时发动“三反”运动，通过疾风骤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迅速改变了局面，赢得了民心，巩固了执政地位。但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来改进政治生态，只能治标但不治本。建国后，毛泽东始终在思考如何避免干部走向腐化堕落的路径，并数次发动规模不一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但其效果却是日渐减退。历史经验表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既需要制度建设的硬性规范，也需要思想建设的隐性涵养。但相比之下，“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0]。

参考文献：

- [1][2] 王朝彬. 三反实录. 北京: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2: 2、9-10.
-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165-166.
- [4][5][6][7][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385、385、155-156、386-387、385-386.
- [9]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50-51.
-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33.

编辑 张 蕾

wellbeing construc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will surely assum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and achieving social shar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saster management;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tability; people's wellbeing

Healthy Aging or Suffering Aging?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 in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View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Xia Cuicui & Li Jianxin

Abstract: Health transi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are the main challenges to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China is now experiencing the third stage of health transition that is called the Age of Degenerative and Man-made Diseases. Chronic disease has become the main ailment threatening people's health and longevity. Research showed that approximately 60 percent of elderly people suffered from chronic disease. New health risk factors,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of health and inequality in medical resources are the main challenges. The elderly people have lived longer but not better. To cope with these problems, precision medicine, full life-course care system and fair medical car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dividual, society and government are all responsible for the elderly's health.

Key words: healthy China; health transition; aging; chronic disease

City as a Conception of Time: On Its Two Dimensions of Memory and Utopia

Zhao Jingrong

Abstract: City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onception of time based on the blowing culture of city, which means that city is not a fixed object but an everlasting and changing process. As a conception of time, city has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which are memory and utopia. The former reflect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city and relates to its history and tradition. The latter leads to imagination for the future of city and constructs its ethics and commun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ity as a conception of time from the angle of methodology. We conclude that the research of city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localization. More primarily, city should be explored dynamically.

Key words: city; memory; utopia; blowing

Space-Time Flow: The City Scales of Mobile New Media

Xie Jing

Abstract: It argues that the new media, like mobile news apps and mobile social networking apps, could be perceived as a space-time machine. It is devot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ity space-time experience constituted by the changes of existing media formats in three dimensions. At the macro-level, information flow produces an overall flowing space-time complex unity. At the micro-level, the narrative flow displays various forms of space and time, taking small slices of reality to build up a jigsaw-style larger composite picture. At the medium level (middle space-time), being invisible, personal experiences gathering offer a new embodiment of space-time experienc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ity space-time shaped by mobile new media are closely related but not unified, thus setting new space-time scales of mobile cities.

Key words: space-time machine; information flow; narrative flow; being with space-time; mobile city

How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 Yunquan

Abstract: Shortly aft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ame into power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phenomenon of "three evils" appeared in the cadre ranks. Although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unched the "three evils" movement in time, quick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won popular support and consolidated the ruling position through a large-scale mass movement with high winds and torrential rain, it improved the political ecology by means of sports governance. It can only cure the symptoms but not the root causes. The spread of the phenomenon of "three evil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with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 was concentrated in certain fields and the behavior of certain groups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whole of the cadre ranks. You can't exaggerate the seriousness of it, and you can't lose it. Limit magnification to judge that the whole political ecology has deteriorated. To investigat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we must first establish a scientific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ecological analysis. The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summed up as solidarity, inclusiveness, liveliness and positive progress.

Key words: "three evils" phenomenon; "three evils" movement; political ecology